

「大同」觀念對早期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孫美堂 中國政法大學

一、問題的提出

19世紀以前，西方文化向中國和日本傳播，以及中國和日本社會對西方文化的反應，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的差異。大致說，越是早期，中日對西方文化反饋的差異越小，相似性越大。例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 來華傳教和翻譯經典、荷蘭人到日本經商和傳播「蘭學」，中日兩國的反應都是排外、開放和折中幾種態度並存，反應也相對平和。隨著西方與東亞文化交流加深、社會影響擴大，

價值與利益衝突日顯，尤其是對這種交流可能帶來的後果惴惴不安，中日兩國的朝野反應都日趨激烈。在如何處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係上，人們的態度也日趨複雜。一方面是虛驕、狂妄與自卑、屈辱混合，在維護文化傳統和國家尊嚴的名義下抵禦西方現代文明。這種思潮因道德情感和「政治正確」而在輿論上佔有優勢。另一方面，由於西洋文化是比東亞文化維度更高的現代文明，它的優勢和吸引力是無法抗拒的，故接受西洋文化、發展現代文明的歷史訴求，悄悄地卻勢不可擋地流行起來。當然，在「西學東漸」的早期，還很少有人清醒意識到：東西文化衝突本質上是前現代與現代的衝突。即使願意

摘要：中國和日本19世紀後期同樣因「西學東漸」而面臨現代化路徑的選擇。日本現代化的道路深受福澤諭吉「脫亞入歐」和澀澤榮一「士魂商才」觀念影響，以發展工業和市場體系為現代化的根本路徑；中國現代化深受傳統「大同」觀念影響，以創建平等和共生共榮的理想社會為目標。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偏離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正道，客觀上為蘇聯模式在中國的興起鋪平了道路。重評「大同」與現代化的關係，有三點新認識：（1）「大同」理想容易陷入農業社會主義；（2）現代工業文明是客觀必然過程，不能依靠道德理想主義和聖人救世；（3）現代化必須面對開放、複雜和不確定的未來。

關鍵詞：大同；烏托邦；民族主義；現代化

吸納西洋文化的開明人士，也不見得真正理解了現代化的歷史大勢，而是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現代化是為了抵禦西方現代化。這種複雜心態，無論在早期中國還是日本，大同小異。

對中國來說，轉折點是中國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及接踵而至的各種挫折；對日本來說，則是1853年馬修·佩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率領的「黑船來航」事件。它們分別對中國和日本產生

了深遠影響，不過它們引起的後果尤其是長遠後果，完全不同。

西方經濟和文化對日本的衝擊，引發了日本「尊王攘夷」與「佐幕開國」之爭，現實主義傾向逐漸克服保守主義，把西方文明當作全新的現代文明加以接受，逐漸成為主流意識——標誌性事件是幕府時代的結束和明治維新的開啟。當然，日本的思想家們同時也主張保留東亞傳統，不過對這種傳統的地位做了重新界定。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當屬福澤諭吉 (Fukuzawa Yukichi) 倡導的「脫亞入歐」說，以及澀澤榮一 (Shibusawa Eiichi) 倡導的儒家道德與西方市場的融合的「《論語》與算盤」論。

福澤諭吉意識到：對待西洋文化，不是停留在表層，簡單地用情感好惡看問題，而要看到它是一種更高級的文明。「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1]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不在於它的表面形式（建築、鐵橋、洋房等），而在於它深層的「風俗」（政治、法律等）。要「從迷信陋習中擺脫出來，而進入心智開朗的境地，發揮全國人民的智慧」^[2]。人人能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創造，整個社會各行各業自由發展，這個民族就能發展起來。這正是歐洲文明的發展的路徑。所以福澤諭吉主張「以歐洲文明為目標」。^[3]

澀澤榮一推崇《論語》和儒家，目的不是維護或者再造一個孔子式的理想社會，例如「大同」或倫理綱常。他推崇《論語》，不是用來與西方現代價值體系和社會結構相對抗，而是作為處世之道和德行修為以服務於現代工商業，將東亞的傳統道德與來自歐美的現代文明尤其是實業結合，其中實業才是主要方面。「歐美諸國之所以能夠繁榮昌盛，完全是依靠工商業的發達。……為了國家的富強，首先必須發展工商業」。^[4] 他呼籲：「培養工商業者的實力，提高他們的地位和品格是當務之急」。^[5]「如果商業不興盛，國家就不富強」；^[6] 澀澤榮一不僅如此說，還親自踐行，創辦日本首家銀行，以及造紙、保險、電話、電信、鐵道、紡織、電力、煤氣等企業。

福澤諭吉和澀澤榮一，這兩位日本現代史上的標誌性人物，雖然具體思路不同，但對歷史的大方向認識是一致的：不是從民族情感而是從文明形態轉換的角度，不是從表面形式而是從深層邏輯的角度分析時局，看待東西關係，抓住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本質特徵，如自由、市場、實業等。這些表明日本這個民族一開始就抓準了西方文明的實質。

面對歐美文明的衝擊，中國早期思想家也有類似福澤諭吉、澀澤榮一那樣的理解方式：把西方社會看作一種更高級的文明形態，應仿效歐美文明，促進中國社會的轉型。早期清醒地意識到西洋文明之高度的人，當屬郭嵩燾。有人說郭嵩燾是當時的「獨醒者」，誠然。他坦率承認歐洲人絕不是我們歷史上所謂「夷狄」；相反，西洋文明在很多地方強於中國；只看到西洋的「堅船利炮」等器物文明是捨本逐末，西洋文明的堅實基礎是它的政治法律和文化

價值。他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造，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7] 郭嵩燾在領悟和借鑒歐洲現代化後，提出了相當於「官退商進」、「國退民進」的產業發展思路，認為那才能真正有效地促進國家、社會的發展。

除郭嵩燾外，晚清民國時期當然還有諸多思想和舉措，或多或少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當作全新的現代文明看待。他們呼籲不能繼續虛驕和狹隘，而是心平氣和地學習、接受，並以此為鑒改進自己。這裡包括嚴復倡導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張謇等人「實業救國」的理論與實踐；以及「五四」思想家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呼籲等。不過，在民粹主義和小農意識佔壓倒優勢的社會思潮中，這樣的睿智或者被邊緣化，或者被視為有害國本的謬誤。多數國人對西方文化不做客觀分析和冷峻思考，而是帶著強烈的情感情緒加以排斥，因而很難真正理解西方文化和現代化，從而錯失歷史機遇。這方面起關鍵作用的是兩大觀念（及其變種）：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理想。

晚清以後的民族主義表現為排外意識和種族危機意識。早先國人以虛驕和狂傲為主，對西方「夷狄」不屑一顧；後來（特別是甲午海戰失敗後），「救亡圖存」的民族危機意識成主導。無論是排外意識還是危機意識，都容易激發人的非理性因素，加深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誤讀。民族的挫折和屈辱激起國人抵制西方文明的衝動，進而演變為抵制現代化的藉口。其實，歐洲資本主義向東方擴張，有雙重效應：既是對東方民族的傷害，也摧毀了封閉、落後、野蠻的舊勢力，迫使東方進入現代文明。100多年前馬克思就作過睿智的評論。例如，他評價不列顛給印度帶來的災難比在程度上以往要深重得多，但又肯定英國人把印度帶入現代大工業。「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8] 他同樣抨擊滿清王朝的野蠻、殘暴和閉關自守。「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正如小心保存的密閉棺材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9]

這些古老制度必須解體，亞洲才能看到「新世紀的曙光」。遺憾的是：多數人沒有把重點用於引進現代工業文明，而是在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抵制西方。當人們懷著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看世界時，他們對民族屈辱和「中華帝國」威嚴遭受的傷害尤為敏感。偏狹和排外 → 挫折和失敗 → 更加排外 → 更加落後與失敗 → 民族危機……惡性循環。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很難理性和冷靜地考察與反思西方文明，很難對有違道德理想主義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產生認同。這時從蘇聯傳過來的理想主義承諾激活與民族記憶中的「大同」觀念，於是，浪漫主義憧憬逐漸遮蔽了對現代化本質的探索，人們普遍希望不經歷資本主義的「陣痛」就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進入現世的「大同」社會。在這個路徑選擇中，康有為的《大同書》開先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趨於成熟，最後因對蘇聯模式的普遍誤讀而匯成歷史洪流。問題是：

- (1) 西方資本主義向東亞擴張時，也普遍激起後者的民族主義。但中國近代史上的現實主義未能像日本那樣成氣候，民族主義卻如此強烈和褊狹，這是為什麼？
- (2) 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入侵激活國人的狹隘民族主義，尚可理解；它激活道德理想主義和烏托邦，其中的邏輯卻有些費解。從民族主義走向浪漫主義和烏托邦，它的具體機制是什麼？有哪些經驗教訓需要重新認識？
- (3) 「大同」觀念對中國早期的現代化究竟產生了哪些影響？烏托邦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回過頭來反思，我們應如何評價？

二、烏托邦選擇的背景問題

西方現代工業文明敲開中國古老大門之初，中國與日本一樣，學界和思想界有多種向路的應對模式，社會發展的路徑也有多種可能。前人為什麼沒有在理解西方現代工業文明、仿效歐美發展市場和大工業的路上繼續前進，卻將「大同」理想寄托在蘇聯模式上，以致造成「救亡壓倒啟蒙」、烏托邦憧憬壓倒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結局。左右這一歷史走向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正統觀點認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人物也曾嘗試學習西方，但「老師總打學生」，這條路走不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讓國人看到了希望，於是學習蘇聯人走社會主義之路。這種說法有許多疑點：第一，「老師打學生」打得最狠的不是歐美，而是日俄。日本自不必說；自《璦琿條約》起，沙俄和蘇聯侵佔領土、屠殺人民（如海蘭泡慘案、海參崴遠東大屠殺）、煽動內亂（如「三區革命」）等，遠超西歐列強對中國的傷害，可我們學的偏偏是蘇俄。第二，老師打學生與學生拒絕學老師發明的現代化，沒有必然關係，因為學生可以學老師的「拳法」用來對付老師，這個道理不難理解。魏源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這個道理；洋務運動也是被動挨打的情況下「學習老師」的舉措。放棄學西方的市場、技術和憲政等現代化模式，轉而學蘇聯，應該是其他的原因。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與日本不同：日本是小國，沒有那麼重的政治和文化包袱，容易接受外來文化；中國作為東亞大國，一直自認為是「天朝上國」、世界文明中心，要放低身段屈尊去學心目中的「蠻夷之邦」，非常困難。這種說法有道理，不過略嫌籠統和模糊。中國自大的自尊心究竟體現在何處？學習西方接受現代化究竟損害了中國社會的哪些方面，以致抗拒西方現代化的勢力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日本之所以成功脫亞入歐，接受西式現代化之路，與它的社會背景以及由這個背景決定的勢力博弈有關。歷史上的日本並沒有建立起像中國那樣極權化的皇權政治。天皇主要是國家象徵，沒有太大實權；幕府掌握實權，但它也沒有達到絕對壟斷的程度。無論是天皇、將軍、幕府還是遊俠，都沒有像中國那樣把企業等經濟社會實體壟斷起來，按權力遊戲運行。各種勢力為了在競爭中取勝，還會採取務實策略。與之不同，中國社會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日益上漲，由民族自尊自強演變為極端排外，因排外而盲目拒斥西方工商業文明，又因如此拒斥現代文明而落後和挨打，其中誠然有複雜的原因，但皇權的「天威」和「尊嚴」保衛戰，才是極端排外和狹隘民族主義意識興起的關鍵。現在的人習慣用民族國家觀念解釋，這未必符合晚清人的一般觀念！當時我們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概念。孫



中山曾說中國「一般的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0] 梁漱溟先生比較中西文化時，也有中國「君民兩相忘」說。「中華民族」觀念是梁啟超、顧頡剛等知識精英倡導而逐漸普及的。有資料顯示，清廷與洋人發生衝突，普通平民往往持旁觀者立場。也就是說，中西衝突至少被不少人理解為朝廷與洋人的衝突，而不是「我大中華」與西方的衝突。真正感受到西方文化威脅的首先是朝廷。早在馬嘎爾尼代表團謁見乾隆皇帝，就是否下跪的儀式發生爭執，就已顯露端倪。西洋「蠻夷」與以往不同，商團敢與朝廷平等談判；保障人權、自由貿易、保障財產權、開設譯館和學堂以開啟民智等，它的可怕後果不是中國國民在外國人面前喪失了什麼，而是這些行為背後的價值觀一旦普遍化，就會讓民眾意識到自己是擁有權利和自由的人，而不是奴隸和「韭菜」，這會動搖皇權至高無上的信念。民間排外思潮被官僚體系操縱，才能激活例如義和團這樣的極端行為。義和團褊狹、愚蠢和野蠻行為，並不是因為維護普通國民的價值與利益，而是面對差異明顯、影響巨大的異類文化，找不到正常和有效的回應方式而採取的過激行為。這裡既有抵禦異族文化的性質，也有抵禦現代文明的性質。由於朝廷操縱用來對付洋人，義和團轉而「扶清滅洋」，成為抗拒外部世界、維護皇權的工具。朝廷的力量以及朝廷操縱的民間力量合流，視西方文化為洪水猛獸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佔絕對優勢。這其中也許有某些合理成分，但客觀後果是拒絕接受西方人帶來的現代化——從基督教到西醫、從憲政到洋學堂、從剪辮子到日用品。越是拒斥西洋就越落後，越落後就越拒斥西洋，惡性循環。

近代思想理論界著名人物對中國道路的選擇，多數都因道德理想主義而走向烏托邦。不過它又分兩種情形：一是對中西文化懷著某種「矛盾情結」：從批判中國文化傳統、嚮往西方現代文明開始，到批判西方社會、回歸儒家理想主義結束。二是並未真正理解現代工業文明，無力解決複雜的現代性問題，從而幻想某種烏托邦。

晚清民國思想家如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對中國文化的弊端與衰落痛心疾首。他們以西為鑒，從多方面檢討中國文化的弱點，批判中國傳統，希望

按西方文化改造中國文化。不過到了後來，他們的立場和觀念發生極大變化。例如，嚴復這位以鼓吹「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而聞名的西學「譯聖」，晚年卻把西方的文明進步比作「搶麵包」的進步；「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11] 在他看來，「忠孝節義」才是中華民族「立國之精神」。梁啟超這位維新變法的旗手，在晚年出版的《歐遊心影錄》中，把歐洲描繪成一幅世界末日景象。他雖然不徹底否定西方文化，但悲觀失望躍然紙上。這又促使他返回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他寫道：「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12] 曾經是激進革命家的章太炎，後來提出「俱分進化」觀：「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13] 既然如此，還要現代化做什麼？孫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戶演講時也有類似判斷：「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就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14]

其實，由歐洲人率先開創的資本主義，本質特徵不是更淳樸的道德風俗，而是用技術、機器、市場等手段取代小農經濟的現代工業文明，是人的自由和權利被普遍認可，是遵循科學理性原則，自由地探索和創造。跟小農時代的封閉和簡單不同，現代工業文明是開放的和複雜的，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以致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當中國現代化的先行者「向外看」時，恰逢資本主義大工業危機重重的時候，進而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和現代化出現的全新問題，與尚未現代化的問題，本不在同一層次上。把二者放在同一平台上，從形式化的角度，從道德和情感的角度下判斷，是許多人誤入歧途的方法論原因。

前輩學者看到了西方的器物文明——機器生產、科學技術、大工業等出現，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極大地開闊了眼界。那些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先驅者們，自然希望中國也擁有發達的實業、繁榮的市場、先進的技術和富裕的生活。不過他們對工業和技術的深層基礎——自由、權利、科學理性等，理解得並不到位，對什麼是西方文化本質特徵、什麼

是現代化和大工業，嚴格來說，多數人仍是一知半解。人們直接感受到的是「落後挨打」的敗局，是「保種圖存」緊迫。深感民族生存危機，呼籲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自強意識，這當然是合理的，尤其是在那個語境下。不過這也導致另一種傾向：民族主義情緒在思想界佔主流，道德理想主義影響了人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模糊了人們對歷史向度的把握。近代思想家懷著既嚮往西方發達的工商業，又因其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道德理想主義而加以排斥這樣一種「矛盾情結」中。這時，西方現代文明外溢而滋生的變種——蘇聯體制誕生了。它名實不符的自我解讀，讓很多人相信這是「勞工的勝利」、「庶民的勝利」，是財富共有、共享的理想社會。於是它喚醒了沉睡在民族記憶深處的小生產烏托邦——「大同」。對蘇俄烏托邦的誤讀比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誤讀離本真更遠。

康有為（以《大同書》為主）和孫中山（以民生主義為主）是近代思想家用「大同」理想解讀當時的全球化和大工業的典型，我們以他們為例子，對20世紀早期人物探索中國現代化的心理歷程，做粗淺梳理和評論。

三、「大同」理想中的現代化體認問題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民國的現代化先驅們，未能像福澤諭吉和澀澤榮一等日本思想家那樣，深入和理性地思考西方工業文明的本質和規律，未能接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層文化與價值，引導國家走民主憲政、科學理性、工業與市場之路，而是在民族主義情緒、「聖人救世」心態下，將似懂非懂的資本主義實業圖景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烏托邦加以混合，納入各自想像的社會文化理想中。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他們設計的未來社會的確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內涵，但這些方案是帶有濃厚的小生產烏托邦痕跡，是「頭腦風暴」的產物——雖然孫中山的思想比康有為的要進步的多，實際得多。

眾所周知，「大同」思想來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論語》、《孟子》和《呂氏春秋》等古代經典中，也有類似的美好想像。這一描述讓歷代無數不滿現狀的浪漫主義者著迷，也為歷代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提供精神動力。不過《禮記》裡的這幾句具體如何理解、如何操作？在現實的歷史中能否發揮實際的作用、發揮什麼樣的作用？特別是：當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來臨之際，這樣的思想對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究竟會起什麼樣的作用？現實社會真的能通過「聖人救世」和「天下為公」走向現代文明嗎？

思想家們的「大同」理想在底層民眾那裡還有另外一種回應。嚮往平等、平均，幾乎是人的本能。當人們面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場景，最容易想到的是平分土地和財富。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這種小農烏托邦意識，想像很美妙，但沒有可操作性。如果靠「克里斯瑪型」領袖型人物硬性推廣，往往事與願違，甚至演變為「多數人的暴政」，其消極後果比他們反對的不平等問題更加嚴重。客觀事實與人們的主觀動機並不一致，這大概是黑格爾(G. W. F. Hegel)所謂「歷史的狡黠」。

「大同」理想本是小生產條件下的烏托邦，具有原始農業社會主義色彩。它被搬出來用於國家未來建設藍圖，康有為是始作俑者。從康有為早期著作看，他對國運衰落、民族危難、眾生悲苦、生靈塗炭，深懷悲憫之心。不過康氏並沒有對現代文明做深入和理性的探討，他其實是位以「聖人救世」姿態出現的幻想家。從《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著作看，他既不是規範的學者，更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政治哲學家。「去國界合大地」、「去級界平民族」、「去種界同人類」、「去形界保獨立」、「去家界為天民」、「去產界公生業」……他的這些主張於洪秀全《原道救世訓》很相似。這些美好的想像沒有可操作性，很多內容荒誕幼稚。這些說法不是基於科學理性的探討，而是教主式的佈道。筆者不相信它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真正的價值。

將古老的「大同」烏托邦用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另一個重要推手是孫中山。他的建國方略和三



民主主義明顯受「大同」思想的影響。跟近代歷史上的大多數思想家和革命家類似，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發展路徑的思考也不是深刻領悟資本主義現代化本質的結果，而是對民族危亡的憂慮。民族主義是孫文學說的出發點，而「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15]「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16]孫中山建國方略包括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給我們描述了美好的國家建設藍圖。不過他的思路不是研究經濟、政治和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客觀規律，而是「聖人救世」的思想路徑。他的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未能在分析現代化的自然發生機制、探討客觀規律、把握歷史趨勢上下工夫，而是詳細地制訂國家實業規劃，像先知一樣指點江山，就此而言他有點類似歐文 (Robert Owen)。他對未來的設計詳細而具體，這樣一來就難免有空想成分。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批評也適合孫中山：「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能從頭腦中產生出來。……它越是制定得詳細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17]「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明顯受「大同」觀念的影響，其中尤以「天下為公」為世人津津樂道。但如何理解「天下為公」？它的權利機制如何建構？在沒有契約精神的前提下，私權與公權的關係是什麼？如何保障公權以人民利益為目的？沒有客觀機制的保障。想像美好，可行性不大。孫中山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大同理想等同。「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8]這類說法很不嚴謹，只能說明先生對大工業時代的經濟，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解不到位。

「大同」和「天下為公」的理想，也被共產黨人所接受，融進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的思想體系中。例如毛澤東評論道：「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19]他在批評康有為之後，論述了共產黨人找到了大同的道路，這就是學習蘇聯。他明確把蘇聯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大同」理想聯繫起來。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中，確實融入了不少「大同」理想的成分，例如「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等。但這是農業社會主義的口號，是小農經濟的產物。

四、幾點結論

中國思想理論界幾乎千篇一律、不假思索地肯定「大同」理想的積極意義，把它視為中國避免淪為殖民地、走向現代化、建成平等正義國家的最佳選擇，對它隱含的問題卻視而不見。筆者的見解與流行觀念不同，主要是如下幾點：

1. 「大同」、「天下為公」的理念容易陷入農業社會主義和小生產烏托邦，而這一路徑帶有反現代化的浪漫主義色彩。

現代工業文明是對農耕、遊牧等前現代文明的否定與超越，它對舊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乃至人們生存的自然環境等，都是巨大的衝擊。因此，現代化一開始就遭到普遍的批評和抵制。德國和法國的浪漫主義、英國的保守主義、俄國的斯拉夫主義，以及中國、印度、日本的各種文化保守主義，都有反現代化特點。^[20]它們儘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以下特點：推崇傳統時代的倫理道德、審美價值、民族傳統和田園詩般的自然生活方式，把宗法社會、小農經濟等前現代理想化，描繪成富有魅力的世外桃源或遠古黃金時代。自莫爾 (St. Thomas More)、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以來，這種烏托邦往往凝聚到各種「社會主義」理念上，到 19-20 世紀，它派生出許多激進左翼思潮。

農業社會主義不滿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弊端，不過它是站在前現代的立場上反現代化，它對歷史的把握是「向後看」。熟悉社會主義史的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批判過「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的封建的社會主義^[21]；他們評價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雖然「非常透析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係中的矛盾」，但它們實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須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22]馬克思、恩格斯也曾提到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例如在《國際述評（一）》中，他們從廣州返回德國的傳教士居次拉夫的經歷為例：當時中國南方造反的平民「要求重新分配財產」、「完全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稱這是「更糟糕的」。為何？對一個「已經接近滅亡」

的國家而言，以暴力的方式平均財富、消滅私產，只能把經濟生產連根拔起，加速社會的脆斷。^[23] 正確的路徑應該是發展現代工業文明。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稱英國影響下的商業發展是「令人欣慰的」事，對包括廣州在內的新航道的開闢寄予希望，並預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中華共和國」將出現。^[24]

中國近代史上思想家和革命家鼓吹的「太平天國」、「大同」世界、「天下為公」等理想，以及廣大底層造反者津津樂道的「平均地權」等做法，明顯具有農業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的社會主義。就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豐富文化價值之內涵、提升審美理想而言，烏托邦理想有一定價值，但它也容易倒向農業社會主義，用小生產的浪漫主義和小農經濟的狹隘觀念抵制現代化，從而偏離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正道。

2. 發展現代工業文明，必須研究和遵從客觀必然性，而不是靠道德理想主義，不是靠聖人救世。

社會歷史演進是事實而不是價值。它是超道德、超情感的，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用黑格爾的話說，它是「歷史的狡黠」。歷史的客觀過程往往是以違反人們的道德理想而開展的。恩格斯曾以肯定的口吻評價：「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杆」。^[25] 我們不能用道德理想主義的尺度衡量歷史進步與文明升級，而應該用超道德的眼光冷觀歷史的改變。思想家的主要任務不是倡導某種道德理想主義，向公眾描述世外桃源、許諾美好未來，而是參悟現代化和工業文明的基本特徵和運行規律，把握歷史演進的大趨勢，明確時代的問題和任務。至於具體如何做，那是大眾自己的事。整個社會依「道」而行，形成自發秩序。政治家的主要任務不是以「聖人救世」的姿態指點江山、設計宏圖，而是改進社會的公共機制和社會結構，理順人際關係和價值關係，優化交往原則，把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激發出來，讓整個社會良性運轉。

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是科學→技術→產業→市場的良性循環，這需要資本的集聚和積累，需要擴大再生產。以市場交換和資本擴張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化，必然是非均衡、非線性和無比複雜的運動。這必然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改進市場機制，推進背後的政治、法律、文化、價值關係等「升級」，而不是平均分配財產、摧毀市場，由某個小集團代表「公共」掌控和分配資源。在小農經濟及其意識形態佔優勢的社會裡，人們視烏托邦為天然合理，不平等一定是金錢、私有制和「為富不仁」造成的。這是農業社會主義的社會心理基礎。但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其低下的社會裡，如果不發展生產，不進行資本積累，而是想均分資源，這只能導致普遍貧窮與落後。

3. 重新認識現代化，積極面對開放的、複雜的、不確定的未來。

與小生產不同，現代工業文明以科學、技術、資訊和機器進行生產，在世界市場這個開放式公共平台上進行交換，這決定了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完全不同。所以當代社會是全方位的開放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為了完成日益複雜的交換過程，社會的價值、資訊必然越來越抽象化和虛擬化。當今的「數字化生存」和「數字資本主義」，就是現代性如此這般發展的結果。

為了適應這個客觀事實，一方面，人的獨立個性和自由度必須日益提高，社會管理和治理體系需要「去中心化」，權力系統邊緣化；另一方面，社會的交往必然需要能容納複雜性和開放性的更高維度的規範與秩序。「大同」理想適宜「小國寡民」的時代，但在大型複雜性社會和「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烏爾里希·貝克 *Ulrich Beck*），把「大同」以及類似的烏托邦作為社會建設目標，顯然不現實。鑒於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現代化和全球化，我們應該從烏托邦理想中走出來，從道德和審美價值的迷戀中走出來，從舊的意識形態定位中走出來，重新認識我們今天的一切，以及它的未來走向。我們要坦誠地承認我們過去的幼稚和狹隘，接受一個我們意想不到的未來，一個日益複雜、抽象和出人意料的未來。

當然筆者不是全盤否定「大同」等烏托邦。

我把烏托邦理解為審視社會問題的一面鏡子，用來映照現實社會的偏頗和弊端，以便人們及時改正；把道德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當作審察我們生活的兩個維度，使我們的價值選擇保持必要的張力，使我們的生活在動態平衡中追求更多的美善。

本文系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 16 屆學術大會的發言稿。

- [1] 福澤諭吉，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9 頁。
- [2] 同上，第 25 頁。
- [3] 同注 [1]，第 12 頁。
- [4] 澀澤榮一，高望譯：《論語與算盤》，（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 年），第 62 頁。
- [5] 轉引自幸田露伴《澀澤榮一傳》，松村信治郎所作《代序》。
- [6] 同注 [4]，第 13 頁。
- [7] 《郭嵩燾全集》第 4 冊，（岳麓書社，2010 年），第 783 頁。
-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86 頁。
- [9] 同上，第 609 頁。
- [10]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640 頁。
- [11] 《嚴復集》第 3 冊，（中華書局，1986 年），第 692 頁。
- [12]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合訂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975 頁。
- [13] 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586 頁。
- [14]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華書局 1986 年），第 409 頁。
- [15] 《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640 頁。
- [16] 同上，第 639 頁。
- [17] 同注 [8]，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4 頁。
- [18] 同注 [15]，第 832 頁。
- [19] 《毛澤東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頁。
- [20] 參見艾愷：《世界範圍的反現代還思潮》，（貴

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21] 同注 [8]，第 54 頁。
- [22] 同注 [8]，第 56、57 頁。
- [23] 以上引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264 頁。
- [24]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263-265 頁。「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特地用法文，顯然是指類似啟蒙思想家鼓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 [25] 同注 [8]，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1 頁。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on Earl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un Meit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 Similar to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hina also faced with the choice of paths to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Withdrawal from Asia and Entry into Europe” by Fukuzawa Yukichi and the economic ethics thought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ous on the one hand and abacus on the other hand” by Shibusawa Eiichi, Japan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market system as its fundamental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which aims to create an ideal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and mutual prosperity. From “A Book of Great Harmony” by Kang Youwei to Sun Yatsen’s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both of them represent a strong concern for moral idealism. The emphasis on moral idealism over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bjectively has facilitated the ascendancy of the Soviet model of modernization as a dominant paradigm for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and modernization, this research has reached three new conclusions: 1. The ideal of “Great Harmony” easily turns to agrarian socialism in terms of modernization choices; 2.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an objective and historical process, it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moral idealism and the salvation of saints. 3.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o be faced with an open, complex and uncertain future.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Utopia,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